

朝鮮歷史研究論叢一  
(一)

中國朝鮮史研究會編

延邊大學出版社

K312.07  
2  
2:1

# 朝鲜历史研究论丛

## (一)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87·延吉  
B 465280

责任编辑：刘建民

封面设计：金胜铉

朝鲜历史研究论丛(一)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

---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院内)

延边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3.72 字数：307.3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

ISBN 7-5634-0014-1·K·2  
统一书号 11503·2 定价：2.70元

---

# 目 录

## 论 文

- 关于任那日本府存在与否问题 ..... 朴真奭 ( 1 )  
高丽前期田柴科土地制度初探 ..... 李成德 ( 23 )  
试论高丽前期兵制与唐朝府兵制的主要区别  
..... 徐日范 ( 37 )  
高丽时期财产继承制度探讨 ..... 崔炯淳 ( 57 )  
论高丽末期的田制改革 ..... 李春虎 ( 75 )  
高丽王朝集权化中的科举与教育 ..... 张在硕 ( 96 )  
北宋与高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 杨昭全 ( 110 )  
论李朝前期土地所有制性质 ..... 姜孟山 ( 142 )  
丁茶山评传 ..... 王玉林 ( 156 )  
朝鲜资本主义萌芽浅析 ..... 金光洙 ( 177 )  
朝鲜开化思想的产生及其主要内容——兼论  
甲申政变中的思想基础 ..... 金成镐 ( 194 )  
中日关于“江华岛事件”的交涉两个  
问题浅谈 ..... 高伟浓 ( 212 )  
“三·一”独立运动及其伟大意义 ..... 李正夫 ( 226 )  
朝鲜战争起因初探 ..... 方永春 ( 243 )

## 论南朝鲜学生在四月人民起义中的作用

- 南朝鲜学生运动系列研究之二……王 健 (267)  
六十年代以来的美“韩”关系……………曹中异 (288)

## 译 文

- 高句丽国号释义……………金在鹏著 刘兴国译 (309)  
关于高句丽大加和小加问题  
……………李承赫著 李运峰译 (326)  
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初朝鲜与女真  
关系略述……………李淳信著 顾铭学译 (340)  
日本帝国主义强夺朝鲜人纪实 (二)  
——强夺 (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五年)  
……………朴庆植著 池明学译 (357)

## 资 料

### 朝鲜史著作、论文、资料目录

- (1900～1985年) ………………孙玉梅 (386)  
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七年十一年间  
朝鲜《历史科学》目录……………金 名 (426)

## 其 他

-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名单…………… (437)

# 关于任那日本府存在与否问题

朴 真 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史学界（甚至全社会）充斥着一种观点，似乎神功皇后征伐新罗，统治过“三韩”，日本在伽倻（加罗）地方设置过任那日本府，统治过朝鲜半岛南半部，以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找历史根据。

如今，几乎已无人继续主张神功皇后征伐过新罗，统治过“三韩”，甚至有些人开始怀疑或否认任那日本府的存在。但是，持后一主张的人毕竟还占少数，多数人仍坚持认为任那日本府确曾存在。尤其最近，在日本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中，还在坚持任那日本府统治过朝鲜半岛南半部的陈腐观点，从而引起日本国内外史学界的极大关注。

笔者在《试论广开土王碑文中的“辛卯年记事”》一文中谈及任那日本府时，否定了它的存在，现在继续坚持这种观点，并试从如下四个方面进一步论证。

## 一 《日本书纪》中对任那日本府的记载

### （一）关于《日本书纪》中的“任那”与“日本”的称呼

“任那”一词，主要出现于《日本书纪》。据初步核实，“任那”一词在该书的崇神纪、垂仁纪、应神纪、雄略纪、继体纪、钦明纪等多处可见，尤其在所谓任那日本府灭亡以

后的钦明纪（532～563年）中更为多见。然而，据《日本书纪》记载，古代日朝关系最密切的时代，是神功皇后摄政时代（201～269年）。当时，似乎神功皇后征伐新罗，统治了“三韩”，又派荒田别等人再征新罗，百济也成了倭的“西蕃”。按日本史学界的看法，这些事件就成为“任那日本府”的起源。尽管如此，在长达69年之久的《日本书纪》神功皇后纪中，却连一条也找不到“任那”这一名称。在一般情况下这是很难理解的。

又据日本史学界所说，四世纪中叶～六世纪中叶，日本在朝鲜半岛南端的伽倻（加罗）地区设立了任那日本府，统治朝鲜半岛南部长达二百年之久，这说明任那在朝鲜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在朝鲜史上除如下三例外，再也找不到任那这一名称，举例如下：

第一，《三国史记》载，新罗太宗王“问其姓名，（强首）对曰：臣本任那加良人，名字头。王曰：见卿头骨，可称强首先生”①。

第二，好太王碑文载：“十年庚子（400年），教遣步骑五万，往（往）救新罗……追至任那加罗”②。

第三，新罗真镜大师塔碑铭载：“大师讳审希，俗姓新金氏，其先任那王族”③。

除此之外，再未出现任那之称。可见，朝鲜方面有关“任那”的记载是极少的，总共只有三条，并且根本看不出任那是伽倻（加罗）诸国的“总称”，更没有古代日本曾在伽倻地方设置“任那日本府”和统治“三韩”等记载。

至于“日本府”，矛盾就更大了。据《日本书纪》记载，“日本”一称似乎早在远古时代就已出现。如日本史上称作第一世国王的神武天皇，又称“神日本磐余彦天皇”，第四世

懿德天皇叫作“大日本彦耜友天皇”。其后，第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天皇也都冠有“日本”、“大日本”等的称呼④；而这些天皇的在位时间则相当于公元前的远古时期，实际上对是否确有其人尚不清楚。今天，日本史学家们认为《日本书纪》关于“日本”之称的记载是后加的，可谓不无道理。可见，仅靠《日本书纪》是无法考证“日本”之称的起源时日。而中国和朝鲜古书则对“日本”一称的起源，提供了良好的证据。

据《隋书》记载，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日本曾向我国隋朝派遣使节，其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字样⑤，这也与日本国名有关，但还没有正式出现“日本”这一称呼。据查，中国古书直到《隋书》尚称日本为“倭”，《唐书》则改称“日本”。具体地说，《旧唐书》高宗永徽五年（654年）条中仍有“十二月癸丑倭国献琥珀码瑙”字样⑥，而《旧唐书》又《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存，据此可推测唐朝初期仍用“倭”，嗣后一段时间才改称日本。《新唐书》无《倭国》传，只设《日本传》，其中写道：“日本古倭奴也……咸亨元年（670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⑦，这可能是中国古书上首次出现的“日本”一称，有些情节虽不够清楚，但可以肯定公元670年左右出现了日本这一称呼。

又据《三国史记》，新罗文武王10年（670年）12月“倭国更号日本，自言近日所出，以为名”⑧。从此以后，《三国史记》中虽仍出现“倭国”字样，但在多数情况下，则是称呼“日本”。据初步统计，自670年至809年的140年间，《三国史记》对日本国号的记载共有十四次，其中称为“倭”或“倭国”的共四处，而称为“日本”或“日本国”的共有十

处，便充分证明这一点。

据上述一系列事实可以断定，在日本历史上，公元七世纪（更具体地说，670年）以后才出现“日本”之称，其前一直称之为“倭奴”或“倭”。

但据《日本书纪》钦明纪，早在六世纪前半期就已出现“任那日本府”等冠有“日本”称呼的统治机构和官僚名称，其情况如下表：

### 《日本书纪》关于任那

日本府记载情况统计表⑨

年代	钦明2年 (533)	4年 (535)	5年 (536)	6年 (537)	9年 (540)	13年 (544)	计
任那日本府	2						2
安罗日本府	2						2
日本府卿	1	1	10		2		14
日本府卿			3				3
日本府卿	1						1
日本府执事		1	1				2
日本府臣			2	1		1	4
日本臣			1				1
日本大臣			1				1
日本府之大臣			1				1
备注 (计)	6	2	19	1	2	1	31

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到，如按《日本书纪》，533～544年之间，已经出现“任那日本府”、“日本府卿”等行政机构和官僚名称，这比日本史上首次出现“日本”一名，要早一百二十年左右，这是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明显矛盾。因为在日本国还不存在“日本”称呼时，便在国外建立了冠以“日本”一名的“任那日本府”，简直是不合逻辑。因此可以断定，“任那日本府”与“日本”称呼，确系后人附加的伪作。

## （二）关于《日本书纪》中“任那日本府”的起源

关于任那日本府的起源及其存在时间，日本史学界的看法极为混乱，大致有如下四种不同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公元前后时期已经存在；第二种看法认为，始于公元二世纪初；第三种看法认为，始于公元三世纪中叶；第四种看法认为，自公元四世纪中叶至六世纪中叶的二百年间为任那日本府的存在时期。二战结束后，最后一种看法逐渐占统治地位。我认为，上述四种不同看法中，后三种看法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根据均主要来自《日本书纪》的神功皇后纪，试举其中二例，作一剖析。

（1）神功皇后摄政前一年条载，足仲彦天皇（即仲哀天皇）九年（200年）“冬十月，己亥朔辛丑，从和珥发之。时，飞廉起风，阳侯举浪，海中大鱼悉浮挟船，则大风顺吹，帆舶随波，不劳橹楫，便到新罗。……新罗王遥望，以为非常之兵将灭己国，讐焉失志，乃今醒之曰：吾闻东有神国，谓日本，亦有圣王，谓天皇，必其国之神兵也，岂可举兵以距乎？即索旗而自服，素组以面缚，封图籍，降于王船之前，因以叩头之曰：从今以后，长与乾坤，伏为御部。……皇后

……乃解其缚为伺部，遂入其国中，封重宝府库，收图籍文书。……爰新罗王波沙麻锦，则以微叱己波珍干岐为质，仍资金银彩色及绫罗缣绢，载于八十艘船，令从官军。是以，新罗王常以八十船之调，贡于日本国，其是之缘也。于是高丽、百济二国王，闻新罗收图籍降于日本国，密令伺其军势，则知不可胜，自来自于营外，叩头而款曰：从今以后，永称西蕃，不绝朝贡。故因以定内官家，是所谓之三韩也。”<sup>⑩</sup>

(2) 神功皇后四十九年条载：“四十九年(249年)春三月，以荒田别、鹿我别为将军，则与久氏等共勒兵而渡之。至卓淳国将袭新罗。时或曰：兵众少之，不可破新罗，更复奉上沙白、盖卢，请增军士。即命木罗斤资、沙沙奴垢(是二人，不知其姓人也，但木罗斤资者百济将也。)领精兵与沙白、盖卢共遣之。俱集于卓淳，击新罗而破之。因以平定比自体、南加罗、碌国、安罗、多罗、卓淳、加罗七国。仍移兵，西回至古奚津，屠南蛮忱弥多礼，以赐百济。于是，其王肖古及王子贵须，亦领军来会。时，比利、辟中、布弥支、半占四邑自然降服。是以百济王父子及荒田别、木罗斤资等，共会意流村……唯千熊长彦与百济王至于百济国，……时，百济王盟之曰：……自今以后，千秋万岁，无绝无穷，常稍西蕃，春秋朝貢。”<sup>⑪</sup>

上揭古书记载，除色彩神秘外，还有严重的实际矛盾。

其一，史学界一般认为，日本在公元三世纪初或中叶尚未形成统一国家，而在九州、奈良等地方开始形成三十多个“小国”。人们不能设想这些“小国”在海外拥有殖民地。

其二，例文(1)中有如下几种突出矛盾：公元三世纪初还未出现“日本”国号(670年才出现)，而新罗国王却说

“吾闻东有神国，谓日本”，此不符史实。神功皇后西征新罗是公元200年，而所谓向神功皇后投降的波沙麻锦（即波沙王）其在位为公元80年至112年<sup>⑫</sup>，两者之间相差八十九年乃至一百二十年。神功皇后征伐的是新罗一国，但向他投降的，除新罗外还有百济和高句丽，这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中国和朝鲜古书中，根本找不到公元三世纪初神功皇后西征新罗，统治“三韩”之事。

其三，例文（1）与（2）之间存在矛盾。据例文（1），公元200年神功皇后西征新罗，统治“三韩”。按理说，倭与“三韩”已变成一个统治区，人们往来极为频繁。但据《日本书纪》记载，神功皇后46年（246年）3月，百济王却说：“吾国多有珍宝，欲贡贵国（指倭——笔者），不知道路，有志无从”<sup>⑬</sup>，令人费解。另外，公元200年以后从《日本书纪》中看不到新罗摆脱倭国统治的根据，却有新罗先后二次向倭“朝贡”的记载<sup>⑭</sup>。尽管如此，到神功皇后四十九年（249年），却突然出现倭派兵“击新罗破之”。这又实在不合道理。

其四，据例文（2），倭派军征新罗，其中有“百济将”木罗斤资，百济王“肖古及贵须，亦领军来会”，“百济王子（肖古及贵须——笔者）及荒田别、木罗斤资等，共会意流村”。后来，百济王宣誓说：“自今以后，千秋万岁，无绝无穷，常称西蕃，春秋朝贡”。

上述事实，从表面上看似无矛盾，但稍作深入分析，便不难发现其严重的矛盾。

战争发生在神功皇后四十九年（249年），但据《三国史记》记载，参与这次战争并发誓为倭“西蕃”的百济肖古王

(指近肖古王)却在位于公元346~375年之间<sup>⑯</sup>,比战争发生年代晚一百年左右,这显然是个很大的矛盾。于是,日本学者们便硬把《日本书纪》的年代下延两个干支(120年),改公元249年为369年,以便符合《三国史记》年代,解决上述矛盾。但采用这种方法,未免过于勉强,不过是一种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愿望而已。

百济在近肖古王时期(346~375年)处于兴旺发达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较高发展,对外关系也相当活跃,一方面努力改善与新罗、东晋的关系,另一方面多次击退高句丽的南侵。据《三国史记》,公元371年,“高句丽举兵来,王(百济近肖古王——笔者)闻之,伏兵于𬇙河上,俟其至,急击之,高句丽兵败北。冬,王与太子帅精兵三万侵高句丽,攻平壤城,丽王斯由(故国原王——笔者)力战拒之,中流矢死”<sup>⑯</sup>。在这种情况下,偏要与倭缔结屈辱条约,宣誓为其“西蕃”,实在不合情理,令人难于相信。

下边,接着考察木罗斤资的生存年代。

据《日本书纪》所引《百济记》,“木满致者,是木罗斤资讨新罗时,娶其国妇而所生也”<sup>⑰</sup>,说明木罗斤资是木满致的生父。

关于木满致的生存年代,《三国史记》有如下记载,百济盖卤王二十一年(475年)九月,“丽王巨琏(高句丽长寿王——笔者)帅兵三万来围王都汉城……王窘不知所图,领数十骑出门西走,丽人追而害之。……文周(盖卤王子——笔者)乃与木盈满致、祖弥桀取……南行焉。”<sup>⑱</sup>

毫无疑问,木盈满致与木满致实为一人。公元475年,百济盖卤王死于战争,其子文周与木盈满致(木满致)南逃。

从这一事件中可以推知木满致的生父木罗斤资的生存年代。具体地说，他以“百济将”身分，“领精兵”征新罗，“平定”加罗七国的时间比公元475年早二十~三十年，大致断定为五世纪中叶。这比荒田别征新罗（249年）晚两个世纪。如按日本史学界的传统做法，把《日本书纪》年代下延两个干支（120年），改249年为369年，也仍然晚八十年左右。这一事实证明，荒田别征新罗时，木罗斤资还未出生，便不可能参加倭的征伐军。因此，《日本书纪》关于荒田别和木罗斤资共同征伐新罗的记载不可凭信，矛盾很大。

从上述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到，例文（1）、（2）都有严重矛盾，缺乏科学性，实属荒诞。日本学者硬把它们看成任那日本府的起源，可谓欠妥。

### （三）任那日本府的官僚机构及其职能

按现今日本史学界的看法，任那日本府持续二百年左右（过去认为更长）。但是，谁也不能明确提出其行政机构的具体情况。尽管在《日本书纪》中散见任那日本府的一些官僚名称，但史学界对此看法不一，很难肯定它的实际存在，举例说明如下。

《日本书纪》雄略纪记载、“是岁（雄略天皇七年，公元463年），吉备上道臣田狭，侍于殿侧，盛称稚媛，于朋友曰：天下丽人，莫如吾妇……当时独秀者也。天皇倾而遥听，而心悦焉，便欲自求稚媛为女御，拜田狭为任那国司。俄而天皇，幸稚媛。”<sup>⑯</sup>

上述记载，表面上看好象倭王任命了日本府长官——“国司”，但实际并非如此，史学界一些人也否认它的实际存

在，笔者持同样观点。

第一，《日本书记》编者记载天皇“拜田狭为任那国司”的同时，又加注介绍了“别本”记载。“别本”写道：“田狭臣妇，名毛媛者……天皇闻体貌丽，杀夫自幸焉”<sup>⑩</sup>。可见，田狭并不是新任任那国司，而是被天皇杀害了，这就完全否定了本文的记载。

紧接着《日本书记》又写道：“田狭既之任所，闻天皇之幸其妇，患欲求援而入新罗。于时，新罗不事中国（指倭——笔者）”<sup>⑪</sup>。《日本书记》的编者实际上也否定了田狭为“任那国司”，这说明编者本身也不太相信这件事的实际存在。

第二，据《日本书记》，仁德天皇六十二年（374年）条中有关“远江国司，表上言”<sup>⑫</sup>；圣德太子在公元七世纪初制定的“宪法十七条”中也有“国司、国造，勿斂百姓”<sup>⑬</sup>等记载。这从表面上看，日本国司制度早在四世纪后半期或七世纪初以前已经出现。

但是，史学界不少人认为，日本的国司制度只在七世纪后半期天武朝施行律令体制后才出现，是一种“中央政权巩固化”的“象征”<sup>⑭</sup>。他们以律令时代以前不存在国司为根据，把十七条宪法视为“伪作”，把仁德天皇六十二年的“国司”作为“国造”之误<sup>⑮</sup>。

看来，《日本书记》关于“拜田狭为任那国司”的记载是不可靠的，不能说明任那日本府的组织机构。此外，《日本书记》钦明纪中还出现了“日本府卿”、“日本府执事”、“日本府臣”、“日本府之大臣”等官名。日本史学界的一些人认为，这些称号不过是“日本”一词与官吏泛称相组合而产生的，说明它不是任那日本府原有的特定官名，很可能是后加的<sup>⑯</sup>。

关于任那日本府的职能，更为矛盾重重。按日本史学界的看法，任那日本府是倭国在海外的唯一统治机构，直属于王朝，它的权力在朝鲜半岛南部应高于一切。但它的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反。

据《日本书纪》钦明纪，公元532年“春正月，新罗打灭任那官家”<sup>②7</sup>，不久就兴起了“复建任那”运动。

公元533年4月，安罗、加罗和多罗的一些官吏与“任那日本府吉备臣（阙名字），往赴百济，俱听诏书（指倭王诏书——笔者）”。同年七月，“百济闻安罗日本府与新罗通计”，派使节到安罗，“召到新罗任那执事，谋建任那，别以安罗日本府河内直通计新罗，深责骂之”，百济圣明王（圣王）“更诏任那日本府曰：天皇诏称，任那若灭则无资，任那若兴则汝有援。今宜兴建任那，使如旧日，以为汝助，抚养黎民”<sup>②8</sup>。

公元535年12月～536年春，百济圣王多次派使节“召任那执事与日本府执事”，要求讨论“复建任那”问题。日本府执事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同时派使节问倭王。对此，倭王说：“朕当以印哥臣（语讹不详）遣于新罗，以津守连遣于百济。汝待闻勅旨，莫自劳往新罗百济也”，在倭王眼中似无任那日本府。同年11月，“百济遣使召日本府臣、任那执事曰：遣朝天皇奈率得文……等，还自日本。今日本府臣及任那国执事，宜求听勅同议任那。日本吉备臣、安罗下早岐大不孙、久取柔利、加罗上首位古殿奚……多罗二首位讫乾智……，仍赴百济”，参加百济王主持的会议，在会上，百济王打着倭王的旗号，陈述“复建任那”“三策”。其中包括“吉备臣、河内直、移那斯、麻都（均为任那日本府官吏——笔者），犹

在任那国者，天皇虽诏建成任那，不可得也。请移此四人，各遣还其本邑”。对此，日本府的吉备臣本身不能反对，只能答应说：“大王所述三策，亦协愚情而已”，并表示按“三策”精神进行的决心<sup>②9</sup>。

上述记载虽是《日本书纪》的编者受“皇国史观”思想的支配所写，但也能说明一些情况。如倭王的“复建任那”政策并不是要通过任那日本府长官得到贯彻，而是要直接与新罗、百济协商，尤其要通过百济而贯彻，在倭王的眼中似无任那日本府。百济并不属任那日本府的统治之下，反而支配着任那日本府，甚至必要时，可以“责骂”或调动其长官。任那日本府（包括安罗日本府）长官在“复建任那”活动中起不了主导作用，反而得听从百济王的布置，他的地位只能与加罗、安罗王的地位相等。

看来，日本学者们主张任那日本府曾统治朝鲜半岛南部的论点，缺乏科学根据，没有说服力。

## 二 好太王碑文不能证明任那日本府的存在

长期以来，日本史学界把好太王碑文与《日本书纪》的有关记载相联系，证明任那日本府的存在。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两者不便联系起来，更不能证明任那日本府的存在。笔者曾在《试论广开土王碑文的“辛卯年纪事”》一文中否定任那日本府的存在<sup>③0</sup>，现仍坚持此观点，并简要补充几句。

第一，公元五世纪初，高句丽长寿王建立好太王碑的日